

※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

懷念韓南教授

張宏生*

今 (2014) 年二月中旬，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的胡曉真教授來香港講學，其間我們一起餐聚，她提到不久前去看望韓南 (Patrick Hanan) 教授，說韓南得了一種比較複雜的病，對他打擊很大，正在翻譯中的《三遂平妖傳》也停頓了下來。曉真對老師非常有感情，言談中，語調很是沉重。我當然也很感突然，不過馬上也回想起一九九七年在哈佛時，曾和韓南的另一位高足商偉兄聊天，談到韓南時，他說，韓南起居有序，為人恬淡，是長壽型的人。因此，雖然得知這個消息，仍然覺得不過是老年人身體一時欠安，不久就會康復。想不到才過了兩個多月，就傳來他逝世的消息。

我雖然早就聽說過韓南的大名，真正見到他，已是一九九五年了。這一年，我希望能夠申請到哈佛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報名參加了夏天舉行的 EPT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即中國「出國進修人員英語水準考試」。我中學原是學俄語的，大學後才開始很不正規的英文學習，一直以來，磕磕巴巴的，談不上系統，只能勉強應付。EPT 是一種標準化考試，特別是最後一部分考作文，對我更是很大的挑戰。南京號稱火爐，這一年的夏天卻不怎麼熱，主要是全國多個地區連續暴雨，江南一帶更是嚴重，長江洪峰一個接一個，水位不斷增高，堤壩常常告急。我曾騎著自行車，帶著年幼的兒子，至長江大橋一帶觀察水勢，回來時經過石頭城下的那條道路，積水已經沒到了車輪的一半，一路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回到家，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對新聞報導中關於水災的描寫就特別關注。碰巧，就在考試的前一兩天，我路過南大校門口，看到報攤上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就買了下來。這份報紙的頭版頭條，大字標題 Floods，即關於中國水災的

* 張宏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報導，赫然在目。可能是出於一種感應，我熟讀了這篇文章，而考試時的作文，正是要求寫中國的水災，就好像是稀里呼嚕地押對了題。這次考試有一個關鍵性的意義，就是我獲得了被學校推薦的資格，因為按照那幾年的規定，是人事處從英文考試通過者中直接選拔。而獲得了推薦的資格，也就使我獲得了能夠和在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任內最後一年的韓南見面的機會。

面試是在這一年的十月，地點是南京金陵飯店。這一年，南大共推選了四位候選人，事前我們被告知，每個人會有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面試那天的下午，我來到金陵飯店，見面後，韓南和藹可親的態度和類似學術研討的氣氛，讓我感到非常輕鬆。認識韓南後，我常聽到不同的人評價他是一個低調、謙和，能為別人著想的人，就我自己和他的接觸來看，也是這個感覺。面試時，往往是他問一個問題，我則滔滔不絕，藉題發揮，說一大通，可能是他的不願使人難堪的性格，使他一直微笑著聽我講，而無法（或不便）打斷。這就造成他問得少，而我則顯得小叩大鳴，二十分鐘當然很快就過去了。這或者也使他有一個錯覺，即認為我的英文很不錯。也許正因為如此，作為被選中的訪問學者，我可以在一九九六年靠近九月的時候才抵達哈佛，而若干事實上比我英文好的訪問學者，反而要提前到校去補習英文。

面試結束，我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我也能感覺到韓南的態度，因此充滿自信。但是，當第二年四月接到錄取通知後，我瞭解到其他一些情況，因而不免有了一些事後的擔心。我一向知道，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是一個學校只有一個名額，而南大這一年竟然有了兩個。這就有了一種可能，即韓南是設法為南大多爭取了一個名額，儘管這一點我只是猜測，後來並沒有問過他，我也並不知道，如果真是只有一個名額的話，我會在什麼位置。不過，他的這個決定，卻使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哈佛的一年過得充實而快樂，有很多奇妙的感受，比如，有些過去感到很大的東西，拉開距離，轉換角度看，就小得不值一提；而有些過去完全沒有感覺的東西，又仿佛是自動來到面前，就像是突然打開了另一扇門。

我到哈佛時，韓南已經卸任，不再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的主任，可能也並不常來東亞系，但我們仍有好幾次較為近距離的接觸。

哈佛燕京學社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機構，在美國，可能沒有第二個機構能夠同時聚集著這麼多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訪問學人。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和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的捐贈有關，一九二八年成立後，開展了很多項意義重大的專案，訪問學人

計畫就是其中的一項。這個計畫對於中國大陸的部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曾長期中斷，直到一九八一年才恢復，其人數則不斷遞增。到了一九九六年，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已有十四人，而來自中國的就有十人。這麼多訪問學人，又是來自不同領域，彼此之間若能互相交流，也是一件美事。北京大學英語系的錢軍教授是有心人，他發現學社每週五的下午都有一個 Coffee Break，是比較隨意的時間，因此就想利用起來，變成集體活動。他也是一個具有行動力的人，說做就做，先後安排了古梅、傅高義、韓南、杜維明等教授來做主題引言，韓南教授的那一場，錢軍正好有事不在，就由我來主持。這一場，來的人格外齊整，我想，除了大家很想聽聽韓南的報告，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這些學者大多是經韓南面試的，大家也想利用這個機會集體向他致意。我做主持，事情非常簡單，不過也就相關問題和他有所溝通，對他希望介紹的內容做了一定的瞭解。我想，在座的燕京學者肯定都知道韓南的研究領域是什麼，但如此近距離地聽他講《金瓶梅》、《癡婆子傳》等小說的特色和價值，恐怕還是第一次。

到了一九九七年，韓南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仍然還在開課，內容是關於《紅樓夢》的專題。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時代，《紅樓夢》是極少的民眾能夠讀到的中國古典小說之一，我從十幾歲時就讀，也不知讀了多少遍，但後來雖然上了大學中文系，由於課程安排的關係，卻也還不會有老師開過《紅樓夢》，現在碰到這個機會，就想補上這一課，當然，也很想瞭解一下國外的老師是怎樣教書的。韓南很謙虛，他說課程太簡單，並不值得聽，但拗不過我的堅持，還是同意了。這門課的開設地點是在哈佛東亞系一樓的一間教室裏，聽課的學生共有十幾人，作為研究生的課程，人數也算不少了。要說簡單，當然也有道理，因為教課的方式就是每個學生分配幾回，在課堂上談自己的理解，其他同學發問，韓南點評。但是，這種授課方式還是給了我啟發，就是對文本細讀的強調。回國後，我也有了講授《紅樓夢》的機會，就把韓南的這個方法帶回來，稍做調整，帶領同學逐章逐句細讀，還真的讀出了以往囫圇吞棗時沒有感受到的一些問題，這或者也是我此次哈佛之行額外的收穫之一。

一九九六年我出國之前，見到《文學遺產》編輯部的李伊白女士，她代表編輯部向我約稿，說《文學遺產》擬推出一個專欄，刊登對海外學者的介紹，希望我能寫一些。這也和我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既然出了國，當然就想看看國外的同行是怎樣做的。於是，一九九七年初，承蒙商偉兄的周到安排，並幫助解說釋疑，我對

韓南做了一次訪談。波士頓的冬天很冷，但室內的暖氣非常充足。那天，韓南身穿一件黑呢絨大衣，進到室內，脫下外套，就是一件短袖白襯衣，顯得很有精神。為了這次訪談，我翻閱了不少材料，準備了二、三十個問題，這或者也使韓南感到滿意，所以他一開始就誇讚，說我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那天的訪談從他走上中國小說的研究之路開始，梳理了其間研究的發展脈絡，一直談到他當下的研究興趣。兩個多小時的交談，韓南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別突出的兩點是，第一，他非常重視文獻的考證，例如關於《金瓶梅》的作者，關於話本小說的語言風格，他都做過詳細的資料排比，在此基礎上進行精密分析。考據是西方學術傳統的一部分，這和中國的乾嘉之學有相似之處，又有一些不同。他早期所受到的英國中世紀文學的嚴格訓練，使得他從事這樣的研究，顯得遊刃有餘。第二，韓南的藝術感覺非常敏銳，他從自己的學術背景出發所進行的閱讀，往往能夠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如對李漁的評價和對《豆棚閒話》的理解等。那次談話中，他告訴我，他正在做《風月夢》的研究，想以此為切入點，研究這部小說和新小說的關係。因為雖然梁啟超提出了新小說的概念，但並不是此後才有新小說的創作，梁的看法應該是對以往創作的一種總結。韓南認為，《風月夢》是較早的新小說，而且通過這部小說，能夠把秦淮文化、揚州文化和上海文化聯繫起來。非常有趣的是，在《風月夢》的結尾，那個妓女從揚州搬到了上海，正標誌著通俗文化的中心從揚州轉到了上海，這可以視為世紀之交的一個特定的點。韓南的這些看法，無疑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小說史的認識。

這篇文章完成之後，先是在哈佛燕京學社在蘇州召開的文化研討會上宣讀過，然後發表在《文學遺產》，都有著良好的反響。而與這篇文章相關，有一件小事，也很值得說一說。記得當時文章寫好後，曾請他審閱，他表示滿意，沒有什麼意見，但仍改了一個字。這一字之改，頗能見出韓南的特點。我的原文是這樣寫的：「韓南教授是紐西蘭人。」他改為：「韓南教授本是紐西蘭人。」是啊，他原籍是紐西蘭，現在已入美籍，當然就是美國人了。所以，這一個字，真的能夠反映出他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苟。他在學術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與這種精神當不無關係。

我一九九七年離美回國之後，雖然也有幾次返回哈佛的機會，但考慮到他年事已高，也就不便打擾，但後來還是見過兩次。一次是在蘇州開哈佛燕京大陸學者會議，他從美國前來參會，只是當時他被眾多的燕京學者簇擁著，也只能打個招呼，

寒暄幾句而已。又一次是二〇〇六年，方秀潔和伊維德教授在哈佛大學主辦明清婦女文學研討會，我應邀參加，最後一天，韓南也來了。他仍像以前一樣，神態沉靜，笑容燦爛，精神很不錯。晚宴的時候，他的好幾位學生都在場，如魏愛蓮、蔡九迪、胡曉真等，我和他一一確認，他顯得很高興，我就開玩笑，說韓南教授是我的面試考官，我也可以加入這個行列，他就很認真地推託，連說「不不不」，但他顯然也很開心。

我一直覺得，韓南是我生活中的貴人之一，他的過世，讓我連著幾天都若有所失，總想寫點什麼，但又覺得不知從何說起。他是一個君子，而中國早就有一句老話：「君子之交淡如水。」回想和他不多的交往，和這句老話真是若合符契，因為除了學術，我們確實也很少說過些其他什麼。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二〇一二年的一天在紐約和商偉兄見面，我們講古論今，聊了半天，其間也談到韓南的著作。商偉兄對韓南的學術有非常精到的體認，這幫助我重溫了他的一些觀點，也聯想起那次訪談的點點滴滴。我還想起在大學講堂上講明清小說的時候，每次提到韓南的相關觀點，臺下同學微微頷首時的會心微笑。因此，我也相信，他的著述既然能夠經歷幾十年仍然充滿生命力，那麼，韓南這個名字一定也會長久地被人們提及，並以其富有歷史性的貢獻，不僅在學術史上得以定格，而且也會隨著學術的發展而得到進一步的認識。

